

# 我们如何“打捞”新时代的梁生宝

——新质生产力下乡土文学的创新性思考

□关仁山

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科技兴起并运用到农业,智慧农业在农村勃然兴起,乡村振兴中的新质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。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农民科技小院、家庭农场、农民的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的有效融合,在城乡融合、三产融合、农文旅融合中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,让农民增加了收入,也大大提升了农民主体性,引发了农民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。所以,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乡土文学创新,不仅能够丰富中国文学的内涵,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## “离开新生活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”

农村生活的丰富实践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离开新生活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,作家怎样深入其中既看到农村结构性变化,又找到新人身上闪光的创造性价值,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当务之急

农村生活的实践,远远比作家的头脑更为丰富,这就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,我们旧有的生活经验是否可靠?离开新生活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,作家怎样深入其中既看到农村结构性变化,又找到新人身上闪光的创造性价值。这是当务之急。既然乡村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,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能用某种单一模式来处理乡村经验。如何进行乡村书写的创变?当我们走出智能时代的新乡村,切身感受乡土的新变。写出相对客观的、真实的农村;通过深入生活,不仅发现问题、抓住矛盾,还要探讨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方案,探讨乡村全面振兴之路新人的振兴崛起。

去年冬天,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讲了一课,题目为《在故乡叩问苍生》。这是学校的“通识教育”大讲堂。讲课中有同学提问,说到了鲁迅的《故乡》,当然也说到了浩然的《苍生》。讲到浩然的时候,我也讲到柳青、周立波、丁玲、孙犁和赵树理、路遥等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我讲课结束,李遇春教授上台总结的时候,把鲁迅和浩然联系起来。这让我心头一震,真是某种巧合吗?说到“苍生”,又让我们想起鲁迅的话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这是作家与芸芸众生怎样的深切关联?进而让我联想到如今的农村题材创作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,今天描写新时代山乡的小说作品,普遍感到肤浅,欠缺深度,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有距离,与这个伟大时代不匹配,究其原因是这些农民的命运没有被真实恰当地描述,如何像鲁迅那样,真正触及当代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,触及农民的灵魂,并深刻追问乡村贫困的深层原因。我们寻找原因和真相,尽可能地接近真相,也许永远不会抵达真相,人间的真相与真理并存,有时清晰,有时模糊,就在我寻找的过程中。

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情绪价值之外,还要有思想价值,提供公共问题的解决路径,才能让文

学作品具有参与改造新乡土社会的价值。描摹有着不同地理环境、历史传统、生活习俗的乡村,还要写出AI智能时代乡村的个性化发展之路。我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,充满人性温度、思想深度和富有新时代创造性的新农民在不在我们身边?如果在,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打捞出来,成功地去“造人”?出于对柳青《创业史》的尊敬,我在乡土题材创作中提出“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”。这是提法,也是一种写作的态度。昨天的供销社、合作社和互助组,那样的环境培养了梁生宝式的农民,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也有合作社、农业小组、龙头企业以及电商等,新的农民的环境、观念、思维方式都改变了。今天的“梁生宝”应该属于新时代的农民典型艺术形象。

我的长篇小说《麦河》塑造了曹双羊,小说《金谷银山》塑造了范少山以及长篇小说《白洋淀上》塑造了乔麦等人物形象,但依然不满足。我最近行走在滹沱河流域和贵州毕节的大山,创作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农民创业史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滹沱河上》。深扎在滹沱河畔的塔元庄深人生活,走访了当地龙头企业,看到这些企业背后的人们在创业中的艰难、挣扎和新变,还看到了常山战鼓、蔚县剪纸和滹沱唢呐等国家级非遗文化的作用。在40多年的时代风云中,富有个性化的新型农民在燕赵大地崛起,我据此创作了新农民创业史的长篇小说,塑造了新农民“梁满沧”的艺术形象。

我多年热衷于进行中的乡土生活,在深入生活中发现,农民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中,产业成熟、分工精细、产业链长、领域多,催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。但是,新质生产力的提升、设备升级以及机器人的进场,使得农民的就业岗位会被部分淘汰。强农必须强农,农业必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,这样就要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。农民老龄化、劳动力、土地流转等要素成本提升,所以,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兴产业,大量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走进城市,城市里有文化的新农民进场农村,“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”的新组合,成为农业产业升级和破局的关键。

## “生活环境越狭窄,经验就越狭窄”

深入生活越多,了解的人越深,看问题就会越敏锐。乡村振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我们把农村问题想透,把农村新故事写好,还是要从研究生活和研究人做起

在这种新的土壤里找到文学元素,先前的经验、自然状态的经验和刻板式的经验就明显失效了。如果生活环境越狭窄,经验就越狭窄;环境越广阔,经验就会越广阔。这种情况下,经过采风便以为自己真的有了生活,其实是一个错觉;因为我们掌握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段,文学创新仅仅是技术问题,这也是一个错觉。如今,我们在思考,作家在与广大农民建立起休戚与

充满人性温度、思想深度和富有新时代创造性的新农民在不在我们身边?如果在,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打捞出来,成功地去“造人”?

新农民典型形象的塑造,首先就是环境的塑造,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,寻找能够呼吸时代风云、凝聚时代气息的新新人物。

共的关系共同体方面,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。作家对当今农村的深刻变革了解不深,尤其是对新时代的农民还不熟悉。对于三农的定位和认识必须端正,必须运用大时代观、大历史观进行整体性的把握,一味地赞美歌颂或者批判指责都是片面的。深入生活越多,了解的人越深,看问题就会越敏锐,激发创作欲望的材料就越多,这样可能把生活的真实感受写出来,把生活体验上升为生命体验。

我们热烈地探讨怎样塑造出属于这个波澜壮阔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,将其作为城市与乡村、农业与兼业、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新时代主体。所以,新农民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从启蒙符号到文化载体的演变。塑造处于乡村漩涡中的新人形象必然复杂,农村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,绝不是AI智能的技术进场能够解决的。乡村振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我们把农村问题想透,把农村新故事写好,还是要从研究生活和研究人做起。

我常常思考,这样的农民新在哪里?比如,打破二元对立的人格图谱、精神返乡者或具有城市生活经验却选择回归土地的“新乡贤”,展现了知识反哺与乡土重建的双向互动。再比如技术新农人,那些运用无人机植保、直播带货的数字时代的新农民,通过电商平台重构了农产品价值链。还有从乡村出来又返回乡村的企业家,把资本带回故乡,也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,完成龙头企业加农户的产业链融合。在农村高彩礼背景下,农村女性突破传统婚嫁观念,在组建女子合作社的过程中成为巾帼商人。如何展现土地主人的脆弱、矛盾和焦虑感,灰色人物怎样成长等问题,也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。还有一些文化“混血儿”,那些既传承常山战鼓、剪纸、木雕等非遗技艺,又擅长短视频传播的复合型形象,能够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共生。这些人物都在呼唤我们走进他们内心世界。

乡土文学需突破传统的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二元对立,塑造具有复杂性格和内心矛盾的人物,既有理想追求,又面临现实困境。应将目光投向乡村中的弱势群体,如留守妇女、儿童、老人等,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;不仅关注人物的外在行为,更深入挖掘其内心世界,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矛盾,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

冲突,等等。在艺术手法上,作家可以采用第一人称、多人物视角或儿童视角等,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和代入感,或将魔幻元素融入现实,以夸张、荒诞的手法揭示乡村社会的深层问题。写作的时候应打破线性叙事,运用倒叙、插叙、梦境等手法,将过去与现在、现实与幻想交织,拓展叙事空间,展现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织。在适当的时候融入方言和口语,增强地域特色和真实感,展现燕赵大地的风土人情。小说看重人性,同时在乎细节,细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支撑点,并且能影响故事节奏,以简单写复杂,以寒冷见温情。在这样的基础之上,我们还可以怎样去颠覆性创新?这就需要作家继续解放思想。新农民典型形象的塑造,首先就是环境的塑造,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,寻找能够呼吸时代风云、凝聚时代气息的新新人物。另外,新人身上应有理想主义色彩,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,表现一种改造时代、推动乡土社会进步的理想人格。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时代语境下,农民形象创新需要突破传统叙事框架,构建更具时代张力的文学样本。

## “透过表层看到生活潜在的矛盾、严峻的困难、深层的暗流”

在新的时代风貌里,现实生活相互渗透、相互交织,呈现出独有的丰富状态。作家应该透过表层看到生活潜在的矛盾、严峻的困难、深层的暗流,用热情而冷静的眼睛观察,靠深入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,才能洞见时代本质。

我们看到人工智能通过颠覆性创新,实现新的技术产品在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,加速培育乡村未来新产业。基于这样的时代环境,我们必须思考乡土小说的颠覆性创新问题,呼唤文本和人物的同步创新。当我们看到高标准麦田里,智能无人驾驶收割机穿梭,麦粒与麦秸的分离之精准,通过卫星遥感器提供土地的数据,智能灌溉与撒药合一,都出现在广袤的田野。当我走进面粉厂,看到三个人控制智能机器,完成分拣、磨面和包装。智能时代农民生命史,依然会焕发活力。

所以我想,新农业也可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跟随我们走来,比如曹德旺、丹志民等企业家。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龙头企业代表,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,从他们身上,完全有可能生长出厚重而有创新精神的农民典型形象。乡村所承载的不仅是国家的粮食安全、国计民生、生态建设等物质性内容,它也承载着我们的历史、人文、乡愁等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。我想,要准确把握并塑造“新质”农人,不仅意识超前,而且能够用来概括时代。以我在新作品中塑造的新农民形象梁满沧为例,他既是常山战鼓非遗传承人,又是龙头企业和村里合作社的领头雁,他是在进一步退两步,一步步骤变而成的,而不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

如今,写作者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新时代的独特风貌,我们既要看到生活表面的巨大变化,也要看到农民成长的曲折历程。传统的道德文化、伦理观念依然起着作用,新与旧、变与不变是相互影响、折射、对立统一的,需要广阔、深刻、全面地体察现实。在新的时代风貌里,现实生活相互渗透、相互交织,呈现新时代独有的状态,作家怎样透过表层看到生活潜在的矛盾、严峻的困难、深层的暗流,是非常重要的。旧有矛盾解开了,新的矛盾和难题又来了。所以,作家在提炼素材塑造人物的时候,所用的素材和细节大多是真实的,关键还要看处理素材的能力,看赋予人物和故事多少新鲜深刻的东西。因此,这又让我想到,呼唤作家主体性的重要性。如果失去主体性,故事会淹没人物,故事成为主角时,人物必然丧失人性光辉。同时,作家主体性的提升,还能帮助作家以更理性的态度思考背后的社会问题。我们要用热情而冷静的眼睛观察,然后再靠深入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,去拨开生活表层的迷雾,把生活看真切,洞见时代本质,这样才能找到人物内心深层情感,进而揭开人物内心的秘密,最后寻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。艺术的本质是挖掘人性的方方面面,以情动人,对于艺术来说,最高的境界是表达人类深层的情感。作家应该沉下心来,用全部力量创作精品力作,为新乡土文学增添新的光彩。

(作者系河北作协名誉主席)

## ■评论

# “四驾马车”的真实录影

——关于《天生我才:冯骥才传》的阅读札记

□黄桂元

人物传记是一门介于历史与文学的“混合”文体。事件是历史本体,话语是历史描述,两者融为一体,化为活生生的人物生命轨迹和毛茸茸的故事细节,便有了传记文学。近期,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的杜仲华的《天生我才:冯骥才传》,是对冯骥才80余载生命岁月的有序展示。冯骥才博学多才,涉猎广泛,很难简单归类。小说家、散文家、画家、艺术鉴赏家、文化学者、艺术教育家、文化遗产保护者等,凡此种种,皆有佐证。为冯骥才立传既要真实记录传主的人生轨迹,还须“术业有专攻”,知晓传主所擅长的文学、艺术领域的成就,拥有相应的认知水准、知识储备和审美积淀,对其在文化传承、艺术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贡献也要有一定了解。

关于冯骥才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作家身份,其以数百万言的小说与散文,构成了具有个人标识度的文学世界。冯骥才的处女作是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义和拳》,与李定兴合作。较之23岁时写出《雷雨》的曹禺、26岁时出版《沉沦》的郁达夫、28岁时写出《家》的巴金、32岁时出版《边城》的沈从文,时年35岁的冯骥才,或可称为“大龄”青年作家。

冯骥才曾有过淘气的童年、顽劣的少年。读中小学时,他乐得不受约束、自由自在,功课勉强

过得去。那段时光,他的兴趣都在课下,弹球、拍毛片、滚铁环、砸杏核、捉蝴蝶儿,凡是男孩子热衷的玩法,他没有不会的。读中学后,他身高达到一米九二,还曾被天津篮球队选中,当了专业运动员。除了运动,他还喜欢看书,先是入迷小人书,对里面的故事和画面充满好奇,后来书读得越来越多。他还对画画很感兴趣,用彩笔把自己对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想象涂在大大小小的白纸上。高中毕业,他曾报考中央美术学院,却未被录取,便自己拜师学艺。每逢假期,他就进京求教,还时常背着画具进故宫临摹,下功夫最多的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,为日后供职于某家书画社从事绘画打下坚实基础。同时期,他读了大量18—19世纪的俄罗斯和欧美文学作品,手不释卷,遐思活跃。冥冥之中,他仿佛听到了文学女神的召唤,灵感频频光顾,不断享受文学能量释放带来的无尽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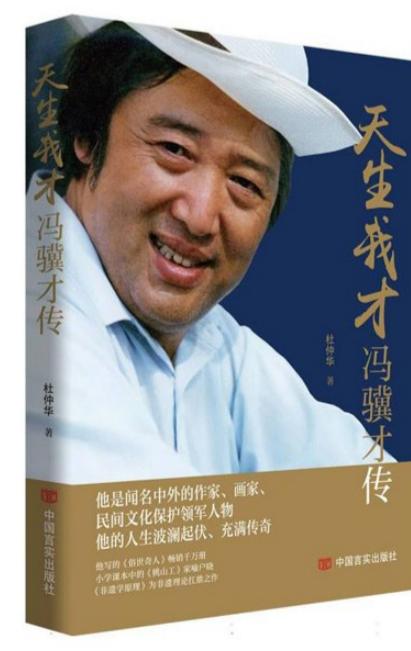
若建立一个冯骥才人生坐标系,纵向轴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轫初始,包括“伤痕”“反思”“寻根”等重大文学思潮,他既是重要参与者,也是积极推动者。说到横向轴,便是与进入新世纪同步的“四驾马车”。他认为,“一个真正的文艺家,身上一定有一个‘频道’,这个‘频道’不仅要有播放系统,还要有接受系统”。所谓“四驾马车”,指他正在从事和推动的四项工作,即文学写作、绘画、文化遗产保护、艺术教育,

也是其文化系统工程的真实写照。

绘画曾被冯骥才形容为“心灵的闪电”,与他的文学写作渊源深厚。他熟谙俄罗斯文学、绘画、音乐,这些艺术领域差不多是那一代作家的审美源头。2002年,他访问俄罗斯,沿着文学艺术大师留下的历史足迹流连忘返。他凝视屠格涅夫的故居,在列夫·托尔斯泰的庄园散步,向契诃夫墓地献花,在广袤的俄罗斯原野和森林间寻找列维坦和希施金的画境,发现许多俄罗斯文豪同时还是出色的画家。从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的作品里,冯骥才汲取和借鉴了太多养分,融于自己的艺术创作。

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于1996年,他用一年时间做田野调查,写作出版了《人类的敦煌》,随即开始投身“留住老城”“抢救遗产”的艰难工程。进入古稀,冯骥才身体力行,亲临现场,投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。他表示,对于民间文化遗产陷入自生自灭的状况,绝不能袖手旁观。如今,他的辛勤付出日渐有成效,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被珍藏或出版,他的坚守感动并唤醒了更多有识之士一同参与,携手相助。

冯骥才身兼多职,他没有“三头六臂”,只能从有效管理时间上入手。他过69周岁生日之际,特意为自己制作了一个“精神蛋糕”,把全年



的时间切割成若干块,分配给不同的工作。这需要持续的激情和超常的自律,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生命动能。有人把冯骥才比喻为“中国文化的精卫”,不知疲倦地填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海。

对于尚健在的人,是否有必要立传?传记并不是盖棺定论,但值得立传的人,其影响力一定是已成某种共识,有立传的价值和必要性。对于冯骥才来说,岁月还在延伸,生活还在继续,传主仍需要接受时间的审视和历史的评价,这也是读者的期待所在。

(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